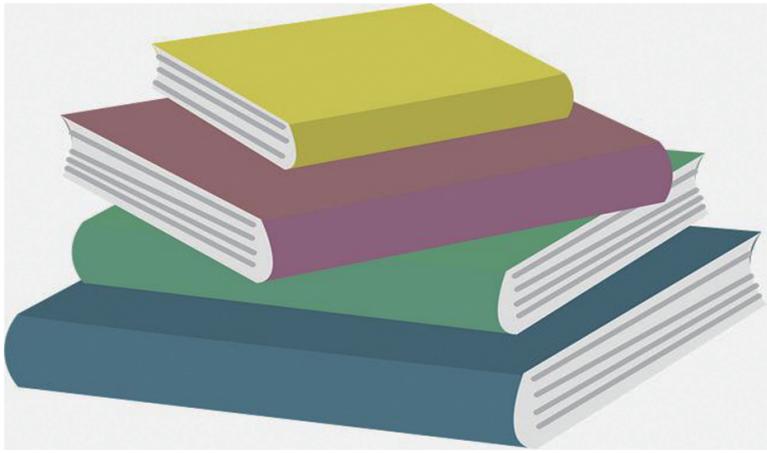


# 售书记

马卓



三十岁那年,我没禁住诱惑,心血来潮出版了一本诗集。作为寂寂无名的写作者,当然自掏腰包。

望着堆得像小山似的散发油墨香的诗集,我心情复杂,喜忧参半。喜的是,多年心血终于汇集成册;忧的是,诗集的去处不得而知……我当时不过是一普通又清贫的乡村教师。

一筹莫展之际,朋友阿昌建议,不妨去职中试试,书是爱情诗集,或许为青春期的学子所喜。除此别无良策,我一咬牙,顾不得面子,豁出去了。其实出书之前,我就考虑到销售的因素,忍痛割爱取消了出版乡土诗集的计

划。阿昌怕我放下面子,自告奋勇帮我一起去卖书。每周五下午,当时尚在乡下教书的我风尘仆仆地赶至县城。待华灯初上,阿昌骑着摩托车,搭着我和一包书穿过整个县城,往郊外学校风驰电掣而去。

头天晚上运气不错,赶上学校文学社开展活动。指导老师是朋友,不遗余力地为我推销,却收效甚微,围观张望者多,真正掏钱购书者少,仅卖出区区十余本。出师不利,心情跌至冰点,真想打道回府,幸好有阿昌打气,自己也心有不甘,决计去班上碰碰运

气,指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吃一堑长一智,我们接下来改变了营销策略。每到一个班级,先给学生人手一册,试阅。阿昌将他的演讲和书法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,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地煽情,“情诗王子”“纯情”这些词汇都被他派上了用场,听得我脸红心跳。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讲演,一边不忘展示道劲有力的粉笔字,引得这些花季少女啧啧称奇,艳羡不已。他方唱罢,我又登场。我的普通话很“塑料”,硬着头皮摇头晃脑地给学生们朗诵自己的诗。一首诗读毕,掌声哗哗,意想不到。

这些前奏一个环节不落,一气呵成,自然而然将青春期的学生带入“售书”的主题。学生们起先排队一个个购书,后来乱了规矩,把我团团围在中间。我低估了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的青春、时尚和野心,他们竟提出签名的请求。我压根没往签名售书这方面想,临时从学生那捞了支笔救急。签名时,一笔一画写下“××同学惠存”或“××同学雅正”之类的套话,然后工工整整署上自己的大名,很神圣的样子。

很快,学生们不满足我千篇一律的签名,要求在扉页或者翻到某首喜

欢的诗,写上一句励志格言或诗句。一个女孩翻至《青萍》那页,我略一思索,写道:在爱的水域,浪迹天涯。一个男生恳求我在《雨夜》那页写点什么,我不假思索写下:撑一把伞,和爱的人走过今生和来世的风风雨雨。还有一个女孩怯生生翻到《失恋者》,不言不语地侍立一侧。我揣测女孩可能失恋了,遂写道:抛却一切烦恼,奔跑在人生的草原,你的长发将飘逸成鬃毛。我大脑飞速运转,文思泉涌,一行行优美的文字流落笔端。

那晚,逆袭成功,一百本书一售而空。

一连跑了八个晚上,走遍学校所有班级,售书近七百余本。印象最深的是,在一个班竟卖了四十余本,几乎人手一册。其中一个男生有点特别,一人要了两本。我饶有兴致地问为何买两本。他腼腆笑道,一本送人,一本留给自己。旁边同学哄笑道,那本送女朋友呢!

……

记得那是寒冬季节,阴雨连绵,冷风嗖嗖。每天夜幕降临,我和阿昌坐着摩托车,缩着脖颈赶去学校;卖完书后从黑咕隆咚寂寥无人的郊外胆颤心惊地回到县城,跳下摩托车,已是浑身冻僵,手脚麻木。回到县城,大抵晚上十点多了,我拉着阿昌围炉煮酒,以此犒劳口干舌燥、饥肠辘辘的阿昌。真应该感谢阿昌那些日子的陪伴和支持,让我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了尘世的友谊和温暖。

我们趁热打铁去了另一所私立学校,吆喝了两晚,诗集告罄。除去成本,我卖书净赚二千,对于当时薪水微薄的人来说,已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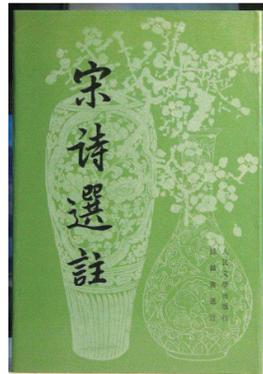
此后十多年,我再没出过新书。如果还有人问我自费出书么,我必定不假思索地摇头拒绝。

(马卓,任职于隆回县教育局)

## ●读书笔记

### 钱钟书的耿介

唐宝民



俞平伯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,他在红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,特别是那本《红楼梦辨》,早已成了红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。但钱钟书对《红楼梦辨》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,早在解放前,他就从学术角度对《红楼梦辨》进行过批评。解放后,俞平伯又出版了《红楼梦研究》,钱钟书同样不看好,对俞平伯“将探春丫鬟的名字由侍书改为侍书”等等问题,都提出过批评。1954

年,文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批判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的运动,那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学术争论的范畴。在这场运动中,许多人都对俞平伯大批特批,但对俞平伯的学术观点一直持异议态度的钱钟书却没有参与其中。

学者汤晏在《钱钟书》一文中写到的一个细节,也显示了钱钟书性情耿介的一面。上世纪50年代,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编选了一套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》,这部丛书里的《宋诗选注》是钱钟书编的。余冠英认为丛书里别的书都称作《某某选》,例如《诗经选》《史记选》《唐诗选》与《话本选》等等,他想是不是请《宋诗选注》的编者钱钟书先生改一改书名,将那个“注”字删掉。余冠英乃遣青年助理刘世德去向钱钟书传达这个意见。钱钟书不肯,他说:“我这部书不能去掉注字。要知道,我最得意的是注,而不是选。”后来,这部书就一直保持着《宋诗选注》的书名。

## ●读《红楼梦》

### 《红楼梦》的水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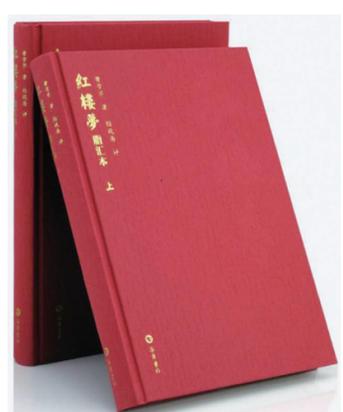
黄三畅

一部《红楼梦》,荡漾着水的意蕴。贾宝玉说,女儿是水做的骨肉,而这部书中写了多少女儿!单凭这一点,上述说法就可以成立了。但是请注意,还有更多的实写水的情节。水,在《红楼梦》中也是一种文化,和书中所描写的其他文化一样,显得特有意蕴。

第五回末尾,贾宝玉来到太虚幻境,与可卿携手出去游玩,不觉走到迷津岸边。迷津深有万丈,遥亘千里,中无舟楫可通,只有一个木筏,乃木居士掌舵,灰侍者撑篙,遇有缘者渡之。无可如何之际,竟被许多夜叉海鬼拖将下去了。所谓木居士就是贾宝玉自己,灰侍者则为林黛玉。贾宝玉能不能被救,全在于木居士和灰侍者,亦即贾宝玉能不能脱离世俗的迷津,全靠他自己和林黛玉的觉悟。整部《红楼梦》的一条重要线索,实际上也是抒写宝、黛在落入世俗迷津中挣扎,最后到达彼岸的过程。

第十七回对大观园里的水进行了细致的描写,“一带清流,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中”“清溪泻雪,石磴穿云,白石为栏,环抱曲沼”,贾宝玉因此有“绕堤柳借三篙翠,隔岸花分一脉香”的联语。里面还有“水声潺潺,泻出石洞,上则萝薜垂垂,下则落花浮荡”的“蓼汀花溆”。原来园子里的溪水名“沁芳泉”,是从外河通过“沁芳闸”引入的。“沁芳闸”这一名称就值得吟味:“沁芳”不能无度,需要节制。贾宝玉取此名,是从冥冥之中获得的灵感吧。后来给潇湘妃子所住的潇湘馆,自然也离不开水:“后院墙下忽开一隙,得泉一派,开沟仅尺许,灌入墙内,绕阶缘屋至前院,盘旋竹下而出。”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潇湘之水。大观园因为有“沁芳泉”而灵动活泼如那些青春靓丽的女儿们。

第二十三回,贾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读《会真记》,见桃花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,他就兜了那些花瓣抖在池内,让它们流出沁芳闸。不久林黛玉来葬花了,说把花摆在水里不好,园子里的水干净,流出去之后就有人倒脏的臭的东西,把花也糟蹋了。是的,杜甫说“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浊”,林



黛玉比贾宝玉更了解水,也寓意林黛玉比贾宝玉更了解世俗社会。

第七十六回,中秋之夜史湘云和林黛玉在“因洼而近水”的四鼎溪馆赏月。“天上一轮皓月,池中一轮水月,上下争辉,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”。这种意境的描写,就是要做足水的文章。特殊环境、特殊时间里的水,更能反映这两个载于《金陵十二钗正册》里的人物的心境。两人联诗将要结束时,林黛玉见池子里有个黑影像鬼,史湘云捡了一块小石片打去,“一个大圆月将月影荡散复聚者几次。只听得那黑影里嘎然一声,却飞起一个白鹤来”。接下来的“寒塘渡鹤影,冷月葬诗魂”的联语,氛围、情境全出来了,称得上是《红楼梦》水文化的震撼人心的绝唱。白鹤被惊扰而无奈地飞出寒塘,林黛玉她们也会像它一样逃离现实的寒塘啊。月,沉在寒塘里才称得上冷月,两具诗魂葬在里面,真是适得其所。“水”中的意蕴,值得细细咀嚼。

整部《红楼梦》是“假语村言”,贾府兴衰的见证人及《红楼梦》的线索人物贾雨村这一形象,也融入了水文化因素。第三回写贾雨村是与林黛玉同路到京城来的,当然是水路,意味着贾雨村是顺水而上。第一百二十回写他的结局,也体现了一种水文化。贾雨村犯了案,被褫籍为民回原籍,在急流津渡渡口草庵中睡着了。这是一种象征:急流津渡渡口也应是警幻仙子推下水的贾宝玉上岸的地方,贾宝玉应该已经上了岸,而世间像贾雨村一类人还正在梦中。

(黄三畅,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)

## ●暇观亭书话

### 我与先导书(三)

易重廉

在哲、政、史书中,我收藏的史书多一点。在史书中,我收藏的文学史著又多一点,因为我研究的是中国文学。

为了工作,我写了一部《中国古代文学概览》,分为48个问题,约二十万字。后来,我忽发奇想,我要独立完成一部《湖南古代文学史》,写出我个人的理解和理想来。我计划从单个作家入手,由点到面,逐步推开,逐层加深。我相信我是可以独立完成的。但是由于个人研究的条件、生活的环境,都不断出现了使我不大如意的地方,加上年事日高,信心终于开始低落。但本文写到的这些还是可以包括在《湖南文学史》之内的。

湖南向称“蛮地”,文学的起步,到唐代晚期,才崭露头角。流寓沅湘的屈原与贬谪长沙的贾谊似应起过很大的作用……

陈书良等编撰的《湖南文学史》认为,南朝梁陈时代的阴铿,是湖南安乡人,故阴铿是湖南以诗名家的最早诗人,留诗30多首。但王齐洲等撰著的《湖北文学史》却指出:阴铿其人,五世前从甘肃武威来湖北公安东北定居,为湖北公安人。二书所定阴铿祖籍一样,但迁居地却一在湖南,一在湖北,完全不同。故我以为,湖南湖北干脆慷慨割爱,让阴铿暂作“自由人”吧……将来有了更确实的材料,再为阴铿定籍贯不迟。

我选择的湖南第一位诗人是李群玉(公元813年生),湖南澧州人。1990年,“李群玉学术研讨会”在澧县召开,我提交了论文《楚骚意识与李群玉》。1991年,《湖南年鉴》的《学会报道》栏,选登了拙文的主要论点。

我在论文结束的时候,这样写道:

“李群玉的诗歌,现存的学术界考定有流失,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,的确很少(不是没有)。因此,那振铎先生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只提到他一首诗。陆侃如、冯沅君二先生专论中国古典诗歌的《中国诗史》,连李群玉的名字竟没有提及,未免有欠公平。人们说,唐代‘三李’: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堪称三大‘李氏楚骚诗人’,如果从学习楚骚的热情与接受楚骚意识的自觉来看,置李群玉于三李之中而合称为‘四李’,我认为李群玉当之无愧。”

我研究湖南的第二位诗人是胡曾。胡曾,邵阳人,是第一位以“咏史”之名为自己诗集命名的诗人。后人对胡的《咏史诗》评价不是很高,在某些人眼里,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。我研究胡曾,不着眼于胡诗本身的优劣,而着眼于胡诗与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特殊关系。

我说过:“关于三国诗,早于胡曾的杜甫、杜牧均曾涉笔,水平也公认比胡曾高。但是,孤文单篇,看不出二杜对三国历史在内容上的全面审视和艺术上的总体构思。只有胡曾,写了十三首三国诗。在我国文学史上,全面概括了三国的历史,又重点表现了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和突出诸葛一人的艺术处理。可以说,即使我们尊胡曾为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第一作者,应该也是有相当道理的!”我常常怀疑,唐代传奇风行,胡曾怎么就未尝一试试呢?

关于武冈邓辅纶(湘中五子之一)的诗歌,1983年10月,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张家界年会上玉玲师

与我即已递交了论文并在大会宣读。大会认为,解放后研究邓诗的论文,这是最早的一篇。1986年刘诚在《求索》第2期上发表的邓诗论文,后于我们宣读的论文整整3年。不过,我们这篇论文,1988年5月,才在《书院研究》上发表,比刘文又慢了2年。问题是萧晓阳先生2008年4月出版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湖湘诗派研究》写有这么一段:“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,除了刘诚关于邓辅纶诗歌的一篇文章外,其他论述的多是围绕王闿运研究来进行的,湖湘诗派的代表作家,‘湘中五子’中的其他成员的诗文创作至今尚无人论述。”萧先生研究学问,应该看到的资料没有看到,反责怪别人没有写过,太粗心了!

魏源是思想家,但我不是思想家。故我写魏源,单写他的“山水诗”。《佛老与魏源山水诗》一文,日本的魏学名家介绍到日本,产生了一定影响。蔡锷是政治家、军事家,但我不懂政治,更不懂军事,故我只写他的诗词联语。《蔡锷新论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,我被提名为“编委”,深感光荣。

陶渊明不是湖南人,却在湖南造了一个“桃花源”。但据我研究,这“桃源理想”,是以东汉以来大官僚地主庄园生活为依据的,最多不过还加进了一点点老庄的“小国寡民”思想与佛教的空观观念。陶氏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地主庄园生活深有怀念,只是无力挽回,他也没有太多哀怨而已。把陶的思想拔得太高,不妥!

(易重廉,湖南黔阳人,曾任湖南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、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)